

■ 学人素描

滨田宏一：货币合作有利于增进双边福利



◎ 史晨昱

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是一位享誉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目前他已从耶鲁大学退休。滨田宏一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哈马达模型”上。即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国际货币合作问题,这一模型也成为关于货币合作的标杆性分析范式。他的研究结论为:各国展开在货币领域内的政策协调,将有利于提高博弈双方的福利水平。合作比不合作所产生的政策效率更高。

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哈马达模型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政策协调过程。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它国家,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相应地,其它国家的货币决策也可能传导到国内,并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策效能,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入效应,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选择,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

但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先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也更加显著,独立的政策安排不再有效。协调产生的合作均衡,将有利于提高双方的福利,不过协调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即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多少)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且,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在长期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会被打破,双方又将开始新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问题是,如果缺乏政策协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哈马达模型进一步分析两国非合作条件下的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纳什均衡。在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点被定义为假设其它参与者不变换策略,任何单个参加者不能以单方面变换策略来提高他的所获支付。假设两国都独立行动,那么均衡点为两国反应函数的交点,经济学上定义为非合作解或纳什均衡点。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反复叠代的方法得到。在这个纳什均衡点上,两个国家都在另一国家政策给定的情况下选取自己的最佳政策,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改变其政策。但是,这个纳什均衡点的产出是无效的。

另一种情形是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是斯塔克尔伯格博弈下的均衡。该博弈模型是一种含有

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性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塔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尾随国。其中,领头国按照其承诺的货币政策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选择。因此,领头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尾随国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领头国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那么,博弈结果达到的斯塔克尔伯格均衡通常是利于先行者而不利后追随者。结果是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充当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博弈的局面最终将会崩溃。

通过分析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的两种非合作均衡可以发现,其均衡点都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如果两国公开信息,经过充分协调,采取比非合作均衡更能改善处境的政策组合,使得双方达到合作均衡。在双方达到合作均衡时,任何一方的毁约行为都将招致另一方的严厉报复而使双方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失。与非合作相比,通过政策协调,博弈双方的福利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

对这三种解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进行任何协调的非合作解(纳什均衡)效率最低,斯塔克尔伯格博弈通过承诺规则来协调两国货币政策,虽然两国的结果都好于缺乏协调时的纳什均衡,但两国得到的好处并不相同。领头国的好处可能多于也可能少于尾随国,即存在“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的问题,所以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有时两国会争做领头国,有时两国又都不愿意出头做领头国。由此,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效率最高的解还是合作解。

深化更贴近现实的区域货币合作理论

滨田宏一在提出哈马达模型后,他的研究视角开始深入到合作国之间的成本收益、福利模型、有效合作与逆效合作中,并利用博弈论和理性预期等方法促进区域货币合作理论更接近实际。

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是指成员国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消各国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所付出的部分丧失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消由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

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所要付出的部分丧失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因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受损的代价,结果是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将会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抑或逆效的。

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滨田宏一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他认为,导致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会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所带来的福利增进就会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体系中较小的参与者就可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它们一方面声称要加入货币合作,分享合作的好处;另一方面,它们又在自身货币决策时不考虑政策溢出,逃避合作成本。如果货币合作的参与者不作出承诺并负担沉淀成本,或大的参与者没有明确可信的威胁惩罚策略,那么货币合作将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成为逆效合作。

二是“偷换战略”。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当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战略组合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参与博弈的国家就会有“偷换战略”的动机。如果货币合作是在多国之间进行的,这种

偷换战略的动机就会得到加强,因为违约国认为其余众多的非违约国不会因为一个成员的违约就放弃共同政策。

三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汇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滨田宏一先后出版了《国际货币依存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国际经济策略分析》(1996年)和《梦想和困境:亚太区域的经济摩擦和争论解决》(2000年)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博弈行为。

2007年,滨田宏一的新著《日本金融危机:过去、现在和未来》出版。在该书中,他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的一些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未来日本金融改革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另外,他在书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如将日本经济封闭性的来源分为三类:一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二为私人适应环境的理性行为,三为日本公众的意识和观念认知。

■ 本期人物话语



次贷危机结束尚需两三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3月20日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次贷危机结束尚待美国房地产价格反弹,这还将需要2至3年的时间。而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政策也只能起到短期作用,不能阻止美国经济走入衰退。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因美国经济衰退而放缓。

■ 多声道

紧缩仍是今年货币政策基调

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3月23日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2008春季投资策略报告会暨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见面会”上表示,目前通胀很大部分是“输入成本推动型”,是一个全球现象,市场应该容忍适度的通胀压力。造成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以及各种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国内因素则体现为货币过多、需求过大。今年货币政策将是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央行的各种调控工具都还有运用的空间,调控顺序可能为央票、额度、汇率、利率、准备金率。2008年仍然是从紧的政策基调。

金融业走向国际市场趋势不会改变

王华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3月20日在“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机遇和风险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虽然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有些波动,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但中国金融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趋势不会改变。银监会将继续扎扎实实地做好完善业务监管政策的基础工作,为该项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商业银行应立足长远,研究制定整体、全面和长期的业务发展战略规划,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向好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3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会上就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要采取的对策问题表示,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但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物价涨幅较高和通胀压力增大。另外,为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还是需要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国际油价飞涨与供求无关

沙基卜·哈利勒(石油输出国组织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3月16日在阿尔及尔表示,国际油价飞涨是由于美元贬值以及市场投机炒作为所致,与石油供求无关。美元持续贬值为国际投机热钱纷纷进入原油和黄金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提供了机会,从而导致油价和黄金价格不断攀高。一方面预测美国经济疲软将导致第二季度原油市场需求下降,一方面又指责欧佩克的政策导致目前油价高涨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陈锦涛 早年“海归”多沉浮

◎ 梁捷

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奔赴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据孙大权博士研究,留美经济学博士(或者硕士)构成了旧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团体——“中国经济学会”的核心。思想传播、政策制定等工作,多半都依赖学会的会员。其中,在最早获得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当中,就有陈锦涛。

陈锦涛,字润生,1871年出生,广东南海人。陈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说起皇仁书院,也是大大有名。那是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孙中山先生曾在此读书。陈锦涛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转任天津北洋大学教习。

1901年,陈锦涛以官费赴美留学。最初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和社会学,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耶鲁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他是货币理论专家,对财政和货币理论的本质有大量经典论述,陈锦涛后来的工作恰也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1906年夏天,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当年9月回国应试,参加清廷第一届留洋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

陈锦涛读书时还有一段插曲,差点让他没拿到学位。1903年10月,时任两江总督的岑春煊把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锦涛调回来,盛宣怀急于阻止。盛说,公学难得有人考得博士毕业,眼看陈锦涛来年就能拿到学位,如果现在让他回来,岂不是瓜不熟而生摘,多么可惜!所以,今后一定要立法,留洋学习必须毕业获得文凭,必须杜绝学生急躁之习,免得浅尝辄止。

陈锦涛归国以后,先入翰林院,又任广东视学、京兆视学,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副局长、统计局局长、预算司司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学部一等参议官、资政院议员等职,积累了丰富经验。

武昌起义后,陈锦涛以病辞归,转道南方。不久,陈锦涛得到伍廷芳提名任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时值乱世,只剩下从政救国一条路。陈甫一上任,就施展手腕推行银行改组。现在,我们回头研究民国时期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整个大背景都与陈锦涛分不开。

中国从1905年开始有了中央银行,那一年成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至1911年,大清银行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银行。陈锦涛担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后,立刻着手设计改组银行,效率惊人。1912年2月5日,设在上海的大清银行在全体股东一致呈请下,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准,改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称“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的背景是官商合办。陈锦涛借用官商联合会的影响力推动改革,得到孙、袁两位总统的批准,成功地把大清银行转变成为中国银行。这是民国时期金融改革的第一次进步,却也种下很多隐患。他在致临时参议院咨文中解释说:“这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既可以增长国家之实力,又因其资金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

陈锦涛主持财政部的短暂时期之内,先后主持制定了《商业银行暂行条例》、《海外汇业银行条例》、《兴农银行条例》、《庶民银行条例》、《惠工银行条例》、《储蓄银行条例》等条例。这是民国初年就定下的法律,影响深远,至今不绝。

南北议和后,陈离开财政部总长的位置,先后任审计处总办、财政部驻外财政员,然后赴欧考察财政情况。1916年6月,陈锦涛又得机会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在唐绍仪没到任之前,陈锦涛还兼任了外交总长。

可是这一次,他的财政总长当得很不舒服。他的精力全都花在政治斡旋上,没有精力推动实质性改革。

此后,陈锦涛与政治核心圈子逐渐疏远。1920年5月,陈锦涛回广东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顾问,曾协助胡汉民整顿广东财政经济和币制。同年10月起,寄寓上海。1925年,陈锦涛复任西北银行经理,是年底再任财政部兼盐务署督办。1926年,陈锦涛与胡光虎等在天津合办中国无线电业公司,这是无线电在中国发展的开端。随后,陈锦涛到刚独立的清华大学法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在陈岱孙等青年学者的张罗之下,清华经济系大有起色,陈锦涛也用他的学识和关系为此出力不小。

1930年陈锦涛退休,寓居天津。他离开学校后,不愿安享晚年,又在1935年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担任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陈锦涛主要作品有《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1934年)、《管理货币制度与通货膨胀释义》(1935年)和管理币制本位定价之商榷》(1936年),都是为当年财政部币制委员会所作。

1939年6月,他在上海病逝。

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了部分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彼此融合程度。除了生产要素外,主权国家还必须探索包括货币合作在内的全球优化配置,以避免微观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国际货币合作的实践。

那么,如何取得预期效果并带来合作成员的净福利增进?这一问题受到了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博弈论自诞生以来,作为一种全新思想的代表,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国际货币合作实际上可视为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博弈协调。哈马达模型因率先引入博弈方法,一举成为关于货币合作的标杆性分析范式。

哈马达为音译,实为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这位已是花白头发、走路颤巍、一口日式英语的老人,就是享誉日本乃至世界的学术大师。

滨田宏一是学法律出身的,1958年获得了东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转入经济系。在1960年至1962年,他从东京大学分获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4年,又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东京大学执教长达21年。其间,曾任日本经济协会会长,并创立日本法和经济协会,并将“法和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国家法制体系的先行者之一,并积极参与大藏省、通商产业省等政策委员会的政策制订。

1986年,滨田宏一赴任耶鲁教职。2001年,他离开耶鲁,出任日本内阁办公室经济和社会研究院院长。2003年卸任后,再回耶鲁。

哈马达模型:货币合作才能提升彼此福利和政策效率

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

■ 西窗听风

节约,也是一种绿色生产力

◎ 梁雨霞

财富的积累,一靠开源,二靠节流。纵观当今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兴旺,都离不开这两个法宝。

提到节流,在我国,最常见的做法是政府动用宣传和教育方式,鼓励人们少用一滴水或少用一度电。在西方一些国家,除了家庭和学校进行早期教育外,还有一套政策与市场并存的完整体系作保障。

以盘活旧货为例,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税收等政策措施,来鼓励人们将那些旧的什物进行慈善捐赠。如果是捐赠给教会或慈善机构,可被折合成市场价,用以扣减当年收入。

盘活旧货的市场有很多,如二手房和二手车等专业化市场,也有可以流通的日常用品市场等。

旧货的流通方式也很多。有长期而固定的二手店铺,也有临时的易手场所;有传统的门面和集市,也有网上的虚拟市场,如eBay。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那些卖二手货和旧货的商店,有以市场赢利为目的的,如古董店等,也有慈善机构开设的经济店,如“救世军”的“thrift shop”即是。

如果说,上述的旧货盘活路径是“单向”的,那么跳蚤类的“swap meets”则是“双向”的。这类临时买卖,一般门槛很低,也无需什么执照,只要“物尽其用,各取所需”就好。

在国外,扔东西可是一门学问。如果是化学品等东西,必须告诉专门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机构,如果是一般大件,则需通知市政或有经营权的公司来清理。

例如,在德国,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居民区的街道旁边堆了很多家什,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居民在准备拆迁,可能那天是当地统一允许扔大件东西的日子。

在“重复使用”方面,德国人也动足了脑筋。比如,铝合金的易拉罐,已经立法废除,而那些吹塑的饮料瓶,也越

来越多地被打上了“多次使用”的标记。为了鼓励人们重复使用,在购买饮料时要支付“押金”,使用后的空瓶子下次带回超市时,机器会吐出一张清单,在购物结账时,此清单可当现金使用。

物力维艰。惜物,被各国人民视为一种美德。英国谚语说,省下一便士,就等于赚了一便士。看来,节约不是一种财富,而且还是一种绿色生产力。

我国人民历来也有节俭的习惯。目前,尽管中国的旧货重复使用机制还不完善,政府的税收优惠仍缺位,市场运作也没有照顾到各种消费者。比如,就旧货市场而言,面向高端消费者的收藏、保值和装饰等奢侈品一类略微成熟,而面向普通人的日常用品方面,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各国文化不同,我国不需要照抄外国的做法。或许,我们仅仅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以“节约为耻”的精神,一种愿意厉行节约并付诸行动的精神。